

### 【内容导读】

开篇第一章学习中外休闲史实，共三节。内容涉及：一、西方社会的休闲发展，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至近代和现代的休闲简史；二、国人传统的休闲生活方式，突出先秦、魏晋、唐宋的文人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及岁时节日等休闲活动；三、中国和西方两者间各有差异的休闲趣味。

学习目的在于通过了解休闲是怎样产生、怎样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了解休闲怎样从劳逸不分到劳逸分离再到现代劳逸重新融合的过程。通过学习这一章可增加对休闲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认识，开阔视野，为学习休闲学以下各章打下坚实的基础。

### 【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有三：西方各历史时期的休闲简况；我国古代民间的休闲方式和文人士大夫游学游仕的人生情节；中国与西方休闲情趣差异的比较。

其难点在于对中西休闲情趣差异的理解和体会。

## 第

## 章

# 休闲：不可或缺的生活

娱乐是人类自然情绪的有意识流露，是心灵情感的激奋反映。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必须进行维持生存的艰苦劳动，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人类的祖先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消遣活动。原始的娱乐是一种融于劳动之中的生活样式，劳动与娱乐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如在捕鱼、捉鸟、采集、制造陶器、弓箭、造独木舟时边劳动边歌唱、高声谈笑等。在他们的生产劳动中，都伴随有消遣娱乐的成分。这在许多人类学家对当今诸多原始或土著民族的研究中也有体现，在很多非洲部落的集体劳动中就可看到劳动与消遣融为一体的情况。例如，人类学家艾伦和约翰逊（Allen & Orna Johnson）对秘鲁的 Machiguenga 印第安人进行长达 18 个月的考察，这些印第安人自给自足，他们消费的每一件产品都是用手边寻得到的材料经劳动加工而成的。他们每天的自由时间要比法国人多出 4 个小时以上。另外，塞林斯发现，很多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居民，比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南非的 Kung San 部落，他们每天只要花三四个小时用于工作，就可以满足简单生活的物质需要了。这是一种简朴生活的富足，这种单一的经济使他

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文化。他们的娱乐活动是随人们劳动之余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而不断发展起来的。<sup>①</sup>

娱乐的来源，除了生产劳动和军事活动外，主要来源于原始祭祀、宗教礼仪和日常游戏。原始歌舞、宗教礼仪和巫术活动释放着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恐惧和迷茫，起着精神抚慰和情绪放松作用，这也可看作是他们的休闲活动。原始的绘画及用贝壳、玉石制造各种装饰品等的原始艺术活动，也是一种积极的休闲。原始人在劳动之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自我宣泄，以求一快。原始部落一有闲暇或庆贺之事，全民狂欢，自娱自乐，并不表演给哪个阶层看，也不带有经济目的。

历史已经表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休闲文化的作用有着十分密切和必然的联系。人类在原始朴素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无论是劳动还是闲暇，都为了同一个目的——生存下去。原始人类的休闲的时间并不少于我们的社会，有时甚至更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休闲伴随人类的诞生而存在，是人类本性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创造的财富日益增多，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因而，闲情的需要慢慢地从劳动中分离出来。

## 第一节 西方休闲简史

在历史上，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休闲有时受人怀疑，有时又被合理提倡。到了 16 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 18 世纪末的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休闲或至少是自由时间的合理性一直潜伏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内部。休闲不是因为它为众多的工人带来利益而存在，而是因为它对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而存在。直至 20 世纪，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休闲的合理性才得到显露，不仅为劳动阶级，也为资本占有阶级所认识，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合理驱动力。

###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休闲

古希腊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社会，休闲只属于特权阶级，奴隶只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但也就是这些奴隶的劳动，提供了特权阶级休闲的物质基础和自由时间。

古希腊自由人的休闲观建立在维持自己和环境协调的前提下，追求认为有价值的生活、自我修炼及增长学问等。那时主要的休闲活动有政治、哲学、教养活动、学问、学术、趣味活动、宗教仪式、定期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竞技大会

<sup>①</sup> 参见李仲之、卢昌崇，基础休闲学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 245 页。

等。古希腊时期盛行进入公共设施的公共休闲，发现并欣赏数的和谐、音乐的优美、舞蹈的奔放。他们认为休闲不仅仅是消遣自由时间，而且应该包括更多的范畴，休闲活动对人的一生有重要影响。他们把休闲看作是锻炼自己、提高修养的途径，是从必需的劳动到自由的状态。认为休闲是自由人的人生基础。休闲是在自由时间里的享受，为了给每个人提供休闲的机会和设施，必须要有好的政府。他们形成了独特的休闲伦理。古希腊盛行对休闲、享乐主动追求之风。在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有一段对古希腊人生活的描述，其中说到“所有这一类的景致使希腊人在美感中获得满足。晚上，在园中散步，听着蝉鸣，坐在月下吹笛；或者上山去喝泉水，随身带一块小面包，一条鱼，一瓶酒，一边喝一边唱；家中有喜事的日子，门上挂起一个树叶编成的环，头上戴着花冠；遇到公众的节日，拿着藤萝和树叶编成的棍子整天跳舞，跟驯服的山羊玩儿。这就是希腊人的乐趣，一个清寒、俭省、永远年轻的民族的乐趣。”<sup>①</sup>的确，古希腊的世界是快乐的世界。早在史诗时代，荷马就说过：“酒宴，竖琴，舞蹈，服装的更换，温水沐浴，爱情和睡眠休息，这一切永远都是我们的爱好。”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宗教仪式也无非是一顿快乐的酒席，让天上的神饮酒吃肉。悲剧、喜剧、舞蹈、竞技表演，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发源于此。当时，全希腊定期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及戏剧公演、音乐比赛和舞蹈比赛等活动。在比赛期间，所有敌对活动一律停止，国人云集雅典，停止公务，免费供应食物。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道：“伯利克里斯在某一次演讲中说过：年复一年的举办竞技和祭献，我们便使得心灵有息劳休瘁的种种可能，正如在家庭环境的常规中，我们有日常的娱乐以驱除忧闷与怠倦。”<sup>②</sup>在日常生活中，雅典人则是午前办理公务，午后便跻身浴室、角力场、剧场中尽情欢快地饱尝消闲之乐。

在古罗马时代，奴隶制度使古罗马的有闲阶层每年能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来享乐消遣。那时每年有 175 天的节假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自由时间拥有之最多的社会。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其疆域空前扩大，罗马政府在全国境内又修筑了许多宽阔的大道。由于交通上的便利条件，贵族及自由民经常在夏季沿大路旅行。当时，这种旅行一般是离开城市到沿海地区游览，一些富有者甚至远程旅行到埃及，在金字塔上去刻他们的名字。据史料记载，当时意大利的沿海地带排列着大理石雕刻、浴馆和浴场、体育馆和寺庙等等这些罗马财富的瑰宝。其消遣旅行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与古希腊的学习和创造等休闲活动相比，古罗马更盛行消费型的休闲。古罗马人制定休闲计划，开发休闲设施，其中大部分是公共设施。古罗马的澡堂、室外剧场、运动竞技场、公园、游乐园等建设甚为突出，作为社交

① [法] 丹纳，艺术哲学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 265 页。

② 本书编写组，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0 页。

活动场所的大众浴池也享有盛名。

与古代奴隶主、自由民崇尚休闲生活相一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休闲理论有一个相当繁荣的发展期。当时的大哲学家几乎无不关注休闲和休闲生活，提出了堪称经典的观点，成为“古典标准”休闲论的起源阶段。<sup>①</sup>

### 1. 注重教养与美德的休闲观

西方休闲思想的学术渊源和文化渊源起源于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并形成了西方人固有的休闲观。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就是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Dionysus）、诗神（Muses）、太阳神（Apollo）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sup>②</sup>《圣经》的“诗篇”中写到：（上帝对人说）‘你们要有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参见同上引文）。早期古希腊哲学家把学问与休闲理想联系起来。在希腊语中的“休闲（Schole）”一词是英语中“学校（School）”一词的原始含义。短语“文学艺术”中“Liberal”一词的含义是：从我们的无知和错误中摆脱出来。知识总是同自由相关，自由又总是同休闲相关。如果休闲包括自由的选择，那么知识则要求我们要做聪明的选择，这正是休闲理想的一部分。

在希腊语中，文化一词用“paideia”，表示，它源自于“Paidos”，该词还有教育和教养的意思。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教育是对人类生活和人类共同体的终极辩护。受教育如同生育一样是本能的。教育保证了文化的延续，就像生育保证了人类的延续一样。古希腊人试图通过教育创造出更高尚的人。此外，“paideia”也涉及到自我完善，它被认为是保护人并使之安全的一种力量。最后，“paideia”常被用来表示神意的实现。教育是指按照某种理想来特意塑造人的品性的一种方式。

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持和传播文化，而且在于促进人的美德和优秀品质。与许多宗教不同，古希腊人并不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他们相信，人只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在这个自然中，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位置。自然的公正之处在于：万事万物都有自己恰当的位置、作用和功能。当某些事物越过了自己的界限，公正就丧失了，混乱也就随之产生，无论宇宙还是人类社会，情况均是如此。在刻有“认识你自己”的特尔斐神殿里，还刻有“凡事勿逾度”的告诫。当人逾度时，他就会犯罪。希腊哲学家认为，犯罪并不是由人的恶的本性导致的，

<sup>①</sup>所谓“古典标准”是指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的观点，经由13世纪的学者托马斯·阿奎纳和20世纪的Josef Pieper和Sebastian de Glazia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所谓的“古典标准”休闲论。称其谓“古典”，是因其发端于古希腊文明时期，并贯穿了整个早期基督教时代；称之为“标准”，是由于它描述了休闲应该或者能够拥有的形式，为后来休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准则。

<sup>②</sup> 引自Josef Pieper, *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p.19。

而是因为人的无知。无知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来避免的，善源于知识。希腊文化的理想用“*arête*”，一词来表达，它经常被译为美德（*virtue*）。最初，这个词被用于表示英雄壮举，后来指高尚的思想和行为。有时，“*arête*”被译为优秀（*excellence*），可指一个人在任何事上的出色表现，但主要用来指灵魂的高尚。美德也等同于人的优秀品质及神意的实现。古希腊人认为人的灵魂中含有自由意志的信念，这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的象征符号是Y表明对不同道路的选择。教育（*paideia*）的理想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人们能够做出选择。知识的整个目的是使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德谟克利特曾说过：“人既不是借助肉体，也不是通过占有，而是通过公正和智慧来找到幸福。”“幸福是一种通过对行为和享乐的节制，对愿望的制约来避免对世俗占有物的竞争而获得的一种安宁的快乐。”“智慧的人会通过磨炼思想来使自己摆脱情欲、迷信和恐惧的控制；他们从沉思与对事物的理解中寻求一种平和的快乐。幸福并不是来自于外界；一个人必须习惯于在自身中发现快乐的源泉。有文化要比富有好得多……没有任何权利和财富能比知识的扩展更重要。快活只是短暂的，声色也只能带来暂时的满足。只有获得灵魂的安宁，获得快乐、节制和平静的生活，人们才能得到更为持久的满足……肉体的力量仅有一种兽性的优势地位；但对人而言，高尚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良好的行为不是出自外在的强制而是来源于内在的信念，不是希望得到回报，而是以其自身为目的。”<sup>①</sup>

## 2. 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成就卓著，并且，他还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特别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什么是快乐、幸福、休闲、美德和安宁的生活。幸福是重要的，因为幸福的目的在于其自身。满足欲望的目的是为了幸福，追求财富、名誉、权力等等的目的也是为了幸福。因此，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得到幸福。他认为，达到幸福的方法是培育起人的美德或优秀品质，正确的行为意味着有所节制。他描述了当某种品质在适当或过多或过少时人们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合适就是美德，太多或太少都是恶。例如，介于贪婪和懒惰之间的是有所抱负的美德；介于鲁莽和胆怯之间的是勇敢的美德；介于争吵和奉承之间的是友谊的美德，等等。这样，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中庸”思想：凡事要懂得节制，任何事情都应有适当的比例，崇尚与自然的公正保持一致的理念。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的某些章节里，他把美德与快乐和幸福联系起

<sup>①</sup> [美] 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 [M]，成素梅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来，他认为，美德是让人愉快的，因为美德是高尚和善的。美德本身是愉快的真正源泉。一个善的人是终身奉行美德的人。因此，他的幸福是持续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用一种不同于我们谈论“空闲时间”的方式来谈论休闲。摆脱必然性是终身的事情，它不是远离工作或任何必须性事务的短暂间歇。我们也许可以利用这些间歇进行休养性的娱乐，在这些间歇中，我们可以休息或恢复体力以重新投入工作。但是，嬉戏娱乐并不是真正的愉快或幸福的源泉，它们与休闲不相干。一天或一个短暂间歇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休闲是终身奉行的美德，而不是指一个短暂的期间。休闲优越于劳动，并且，它是我们通过劳动来寻找的目标。这时，在亚里士多德的脑子里可能已经产生了公民优越于奴隶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十分明白自愿和非自愿的行为之间的区别。非自愿的行为是因为缺乏自我控制，它等同于罪恶或者是因为受他人的强迫，也可能包括对监护人或法制所给予的惩罚的恐惧。人们必须谨慎地去选择美德。如果一种好的行为是你被迫做出的，那么，这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其中不存在美德，因此，对我们的休闲观来说，如此重要的“自由选择”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使得美德成为可能，也使得幸福成为可能。

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好的活动，事实上，是一种神圣的活动。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相信不同的思考和推理能力可以将人区别开来。正因为上帝无所欲求，所以他才能够把时间花在杰出而天才的沉思中。在这种沉思中，我们越来越可能认识到：在自己的本性里什么是最神圣的东西。那时的哲学家认为，休闲不仅仅摆脱必然性，也不是我们能够选择做什么的一段时间，而是实现文化理想的一个基本要素。知识引导着符合道德的选择和行为，而这些东西反过来又引出了真正的愉快和幸福。灵魂的高尚、与神圣事物的联系，等等，正是这些理想孕育了休闲哲学。

纵览亚里士多德思想，我们可归纳出这样几点：（1）休闲与沉思不可分割，休闲的人是沉思者、思想家。（2）休闲是科学和产生哲学的基本条件之一。（3）休闲与幸福紧密相连，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快乐的。（4）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只有音乐和沉思冥想才是具有休闲资格的活动，其中沉思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理想的休闲行为。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西方人的休闲传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3. 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的快乐观

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者们认为，世上存在两种优劣殊异的快乐，一般说来，较高层次的快乐常常是指沉思、欣赏和开发智力所带来的快乐，这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较低层次的快乐大体等同于一种周期性的，对天生嗜好做出的反应。例

如，搔痒给人带来快感，但实际上没有这种痒会更理想。伊壁鸠鲁和他的学生们就过着一种极简朴的生活，他们吃的是大麦面包，通常的饮料仅是水。他认为快乐是选择或决定一种行为的唯一标准。他把每种快乐都看成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也是善良的和合理的。不过他指出有些快乐必须摒弃，因为它们最终会引起不幸或痛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曾说到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满足和幸福”，而他本人则“优游在幸福和宁静之中”。伊壁鸠鲁在他感觉到死神即将来临之时，洗了一个温水澡，要了一杯醇酒，慢慢地饮着，在勉励他的朋友们效忠于哲学中进入天国。<sup>①</sup>

## 二、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休闲

古罗马没落后，天主教和封建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两者共同支配着中世纪时代。在中世纪，天主教会控制着大部分休闲活动。亚里士多德重视休闲内在价值的哲学，为教徒如何符合教规地打发闲暇时间提供了指导。因此，中世纪初的人认为休闲的最高境界是祈求拯救的冥想。中世纪维持了“宗教一个人”中心型的休闲形式，与天主教的宗教秩序相一致的休闲主要有：宗教仪式、周日活动，在教会的广场及村落的公用广场等地举行的仪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骑士集团为统治阶级，属有闲阶层。骑士为封建领主做骑马竞技、剑术、枪术、跑步、投石等身体训练。中世纪时另一个特征是城市的诞生和行会的出现，由独立商人和手工业者形成早期的城市市民因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更加追求现实的安乐生活。

西方世界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后，迎来了文化的黎明——文艺复兴，这时，学问和艺术等领域的人文主义新思潮以意大利为中心兴盛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在贸易、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人们积蓄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他们把充足的财力和时间投入到娱乐和休闲生活中。社会生活很自由，人们可直接参与狩猎、宴会、舞会、歌剧、演戏、艺术等活动，并以财务援助的形式促进艺术、文学、娱乐部门的发展。增加了剧场、歌剧院等艺术型的休闲设施，许多有巨资的艺术赞助者更多地光顾画廊而不是皇宫、教堂。

文艺复兴把人类情感从充满金钱欲的中世纪解放出来，把人类的理性从宗教的戒律中解放出来，从而构筑了数世纪以后产业革命的基础，形成了近代欧洲上流社会社交活动和休闲享受的风气。文艺复兴还使人们从长期以来宗教式的和超自然的思考方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严肃的思考和思想，具体表现为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想。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休闲进行了再评价，这对休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sup>①</sup> [德] 马克思，博士论文 [D]，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

这一时期，人类对休闲与工作的看法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在《圣经·新约中》，圣保罗肯定了维持秩序所需的工作、公平的报酬和纪律的重要性，强调工作是规律生活的一部分，不亲自努力赚取食物是不公平的。托马斯·阿奎纳依据人的职业和工作来排定理想的社会阶级，职业的贵贱根据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因此，工作才有了价值，它是社会合法、安定的基础。马丁·路德认为，工作不应只是为上帝服务，而是人人都应该负担的道德责任。他认为工作是神圣的，是服侍上帝的方法，能够将人类精力妥善地转化到物质世界中。在这一时期，新教徒的工作观念正逐渐崛起。工作不再被认为是低下的，而是可以带来报酬，会给一个人的未来带来精神以及物质上好处的一种活动。休闲反被认为是一个罪恶的诱惑，耽于安逸享乐的人被认为是缺乏自我控制，缺乏人生目标，缺乏理性思考，而且是不敬神的。清教徒的工作观颠覆了传统的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平衡。这一观点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渐渐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工业革命之后，更助长了工业资本社会的成型。

宗教改革给劳动观念灌输了宗教意义，把劳动当作人类生活最神圣的、最高的境界，把不劳动和休闲看作罪恶。这对西方世界劳动生活观念的影响极大，这种工作伦理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

### 三、近代工业文明时代的休闲

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的集中，城市劳动者的出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区分更加明显，从而加剧了社会等级分化。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工作与休闲职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工业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此以后工作与休闲走向了两极。在工业化程度要求很高的工作中，工人无非是机器的延伸或是机器的替代品，而这种工作必须和其他生活内容区分开来。特权阶级则通过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掠夺而成为一个“有闲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分化出一小部分既有钱又有闲的“有闲阶级”，也产生出一个终日无休止地劳作的工人阶级。劳动与休闲分离了。在许多方面，有闲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是历史上的新现象。这两个群体的第一代几乎处于一个天平的两端。处于这一端的人有充裕的金钱和自由时间，却几乎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处于另一端的人则长期被迫从事一些标准化的、没完没了的劳动，但他们很少能体验到公共的闲暇。而且，在工余时间，几乎没有自我选择的个人消遣方式。在各自的处境中，这两个阶层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工人阶级不仅要受制于企业主，而且还要受到一个已经出现的、适应于大生产过程的世界的控制。

在现代社会，“工作”一词被广泛地用于描述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人对自认为有价值的或别人企求的目标所做的有系统的追求过程。工作是以创造有社会价值的产品为目的，并为此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活动。另外，社会的价值体



系内有一种默契，即工作是不得不做的，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必需。由此，工作决定休闲，是休闲的前提条件，休闲依附和模仿工作，空闲时间也是由工作所塑造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工作给了我们尊贵的地位，它让我们精疲力竭但却能增加财富。而休闲则在工作之余为我们提供了愉悦的体验，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身为人类的完美意义。工作与休闲是一个连续且不可分割的过程。

超长的劳动时间和过度的劳动强度引发了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工人运动，并最终导致标准工作日制度的形成，工人的休闲问题终于成为社会性问题。工人的休闲是从被压迫的状态中恢复精力的一段时间。近代休闲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保证生产劳动持续地进行，劳动成为近代社会的日常文化，劳动文化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各种与生产相关行为的相应社会价值。

从这些最初状态开始，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逐渐形成了。通过工会，蛮横程度越来越小的管理以及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而且，在许多场合，他们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工业社会也依赖于制造业中的技术革命。越来越先进的机器有助于棉纺织品、面粉、木材、肉类包装等产品的大批量生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1889年，泰勒（Frederick Tayler）建立了一家咨询公司，他提出建议帮助企业提高效益。泰勒主要对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工作方法与每一动作所需的时间进行了研究，其目的在于发现最高效率的生产方法。他称自己的系统为“部件熟记程序”系统。每个工人以这种最有效（即最快）的方式来完成工作。在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机械化生产所进行的服务中，人本身被转变为一种可以替代的机器。泰勒的兴趣一部分是被解决劳动问题的愿望所激发的。在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劳动力的短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缺乏强壮的、吃苦耐劳的工人。当时，效率成了增加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同时，科学管理和人类工程学又是提高效率并从而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工作与休闲时间的比例成为可能。对工人阶级来讲，休闲的含义首先就是要缩短工时，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此，他们在斗争中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以后，关于人充分利用自己的休闲潜力以达到自身完善的观念渐渐地发生着重大的改变。

工业主义以另一种几乎是相反的方式使得休闲合理化了。从时间角度分析，因为要有利于生产，休闲一直处于欠合理状态。但现在从生产与消费结构分析，为了有利于消费就必须要有适度的闲暇时间，从而休闲就成为合理的了。消费就是花钱并消费时间。事实上，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消费已经成为为数众多的人的主要选择，在这些人中，既包括青少年也包括成年人，他们除了进商店、逛商业中心和集市一条街以外，根本不知道在空闲时间中应该干些什么。如果没有夜生活和周末，娱乐业将会崩溃，如果没有假期，旅游业将会衰落。实际上，是休闲而不是劳动使得工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在这里，休闲的新的合理性

展现出来了。在这样的经济状态中，失业的麻烦不是由于失去了生产性的劳动，而是因为失业者没有更多的钱去消费。现代的经济问题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缺乏足以保持每个人进行生产的消费能力。

只要娱乐同促进物质效率一样，被人们作为一个合理的目标来追求，那么，在道德上和生活方式中，人们肯定能为娱乐找到一席之地。渐渐地，工人阶级开始要求休闲，这并不是因为休闲会为完善自我、巩固家庭生活提供帮助，也不因为它是暂时返回到自然状态的一个机会，而仅仅是因为现代工人正在出卖自己的时间并尽可能地想获得最好的商业性回报，工会逐渐使工人阶级有权为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谋求到最好的经济回报。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已经习惯了富有生活的有闲阶级成员会将兴趣逐渐转移到更为广泛的和多种多样的休闲目标上去——从慈善事业到野外冒险。这样，随着阶级差别的日益缩小，现在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过着工业革命开始时资本家可能会希望他们过上的那种生活，他们成了总是期望得到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的消费者和心甘情愿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好”工人。

在现代社会，因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工作的创造性、技能性和自由性等因素的作用下，工作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已不再是一种苦役，而变得越来越像休闲了。这一趋势应验了马克思之言，如果劳动成为人的需要、目的以及意义之所在，那么工作与休闲的结果就会趋于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化、自动化设备已经能执行以往靠人工操作的重复劳动以及危险性的工作，白领工作者渐渐取代操作重复机械劳动的蓝领工人，许多人解脱了沉重的劳动，工作与休闲已经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结为一体。

20 世纪以来，电影电视等影像媒体的出现，工资收入的显著提高，劳动时间的逐渐缩短，劳动法的制定，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等，都为人们带来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形成了大众娱乐。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政府、企业主和工会都致力于公众的休闲活动，北美开始实施双休日制。这意味着休闲活动不再是富有阶层的专利，更多的大众参与了休闲，真正意义的大众休闲文化时代开始了。

现代社会随着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消费的共同增长而进入大众休闲时代。休闲的意义和重要性对劳动阶层来说在逐渐演变，并最终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0 世纪上半叶，个人对于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人们已经把休闲理解为选择一种能发挥其禀赋特长，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活动。外出旅行的可能性增加了，随着各式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普及，人们的休闲潜力也被开发出来。针对这一现象，法国当代社会学家杜马哲迪尔指出：今天，休闲已成为数百万、数千万劳动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劳动、家庭、政治、社会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新的角度看待劳动与休闲的问题。韩国学者金光得指出“休闲为了劳动”的观念正朝着“劳动为了休闲”方面转化。

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引起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

变化，使人们丧失了完整性，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安，从而导致从休闲中而不是在劳动中寻找人生意义的倾向。为此，人们组织读书会和唱诗班，参加体育活动，开展成人教育，并发明了许多工作之余的活动。这些措施促进了人们努力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等变化的普遍的大众休闲生活方式。

## 第二节 国人传统休闲观与休闲方式

我国有关休闲文化的历史相当悠久，在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里，在优秀的传统文化宝库中，记录休闲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这其中既有文人士大夫及官宦帝王阶层的生活情趣，也有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稼穡之余的节庆游戏。只是在近一个世纪里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特殊性，相比较西方社会，休闲文化跌入低潮。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休闲生活起步较晚，休闲文化研究不很发达，甚至“休闲”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还被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及受某些自然、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常采取较长时间的休闲……”

### 一、我国古代休闲理想与休闲生活

#### 1. 先秦时期休闲思想的产生

中国的先贤们对“休”和“闲”二字的创造和使用，可谓别具匠心，至今耐人寻味。特别是对休闲的独特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闪亮的明珠。《诗经》中，在赞美自然和生活的诗歌中表达了大量的休闲思想、休闲文化和休闲方式。《小雅·六月》中的“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大雅·生民之诗·民亦劳止》直接阐述了休闲、小康和国家安定兴盛的重要性，“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以定我王”，“民亦劳止，汙可小休。”《小雅·十月之交》则强调统治者应关心人民的休闲：“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诗经》之外，我国休闲文化主要受到儒家孔子和道家老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老子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在他的《道德经》第25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遵循自然法则，自然而然为之。因而，他强调，人应该“致虚极，守静笃”（第16章），“清静为天下正”（第45章）。表明了老子学说重在精神自由、人格独立、追求生存理想的境界。

孔子的休闲思想不同于道家理论，他主张的休闲与其积极入世、努力创造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相辅相成。如他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等，都表现出一种休闲的理想。从历史记载看，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其主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修齐治平的目的是达到施行仁政理想，而仁政的最高境界却是一种闲适的与大自然合一的状态。从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孔子已将闲适的游艺这种类似于审美的自由境界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休闲审美和艺术在人的主观意识修养中有重要的作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重要的对话，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足。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亦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论语·先进》）此段记载说的是孔子在携弟子们出游途中，讨论治国执政的想法，四个学生有四种不同的观点。子路主张让人民勇敢，明白一些道理；冉有只能让人民饱暖，礼乐教化他办不到；公西华仅满足于自身充任类似于小司仪似的小相。最后，孔子问曾皙，曾皙回答：“我的想法和他们三位有些不同。”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便说道：“暮春三月，脱下冬装，换上了春天的单衣，相约五六位青年，六七个少年童子，在沂水里洗澡游泳，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放声高歌，然后一路唱着歌尽兴而归。”孔子听后，长叹一声说道：“我赞同曾皙的想法呀！”在谈论“志道”之策时，孔子竟然同意一种放浪于山水中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闲适与游乐。对此，他的很多弟子是不理解的。或许曾皙当时所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只是一种想法，其目标是创造社会平等、祥和，使人民生活安康、快乐，充分享受大自然的赐予。这样一幅人生图景的确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这样的想法符合孔子一贯的仁政主张和人生追求，自然得到孔子的赞同。当然，闲适游乐中的治国之道和人生境界，离现实过于遥远，这只是孔子的一个理想。就理想而言，治国从政可以在一种轻松的、无拘无束的闲适游乐中去完成。只是，这样的理想自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余年间何曾实现过？或许孔子在游仕途中诸多碰壁后，也有所觉察和感慨，所以考虑政治理想如若不能实

现的问题。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之于海”，（《论语·公冶长》）这是说“我的主张如果不能实行，就乘着木筏出游湖海去”，这即是后来李白所唱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也即读书人很普遍的一种闲适生活方式。

老庄哲学更充分地体现了对闲适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是体现道家休闲思想的经典之作。《庄子·刻意》中有“就蓺泽，处闲旷，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偏远幽静之处是江湖中人、远离尘世之人、闲暇的人所向往的地方。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大知”者的境界。《庄子·齐物论》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智大言”者宽裕广博，言谈美盛。

先秦时孔子与老庄等先贤的休闲思想为后世发扬光大、身体力行。

## 2. 高士隐逸与田园生活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激烈，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远离政治的心态，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与日俱增，他们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魏晋文人好辩，精通“三玄”（老、庄、易），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而且著述有成。这种风尚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隐逸遁世啸傲林泉就是其突出的表现。隐逸玄游主角是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玄学家们。这些执著于不同的思想观点和追求，漠视政务利禄，极力推崇高情远志、名流风范，既追求“庙堂”之上的尊荣，又向往山林隐士的美名，恰如向秀、郭象所宣扬的“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那种人，他们痛恨现实政治和名教礼制，思慕老庄逍遥游，崇尚远离尘世而栖息山林，寄情山水田园自然风光，他们往往寻找好山好水好景的自然环境，辞官隐世遁名，清谈玄虚。于是，社会上逐渐形成游山玩水放浪形骸的风气。

魏晋隐逸玄游起自三国魏末的“竹林七贤”。其中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虽然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分歧比较明显，但都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的解放。其行动则表现为饮酒、服食、狷狂、崇尚隐逸、寄情山水和优游林下，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的一种表现。追随“竹林七贤”玄游山水，几乎成为当时士子处世避祸、对抗黑暗现实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名士多崇尚玄虚，娱情玄游。

西晋末年，社会激烈动荡，政治特别黑暗，名士更无出路，遂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纷纷恣情山水，妙谈玄理，玄游之风更加盛行。东晋诗人陶渊明是隐逸田园的代表人物，由于不愿受官场束缚，41岁便还家归隐，游乐田园。创作了《归去来兮辞》、诗《饮酒》、散文《桃花源记》等抒情言志的隐逸诗文，表达

了对徜徉于山林、逍遥自得生活的由衷赞美。流传千年的《桃花源记》中构想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他的田园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质朴、平淡、自然，开创了我国古代田园诗的清风格。

南朝时的著名高士宗炳，好山水，爱远游，以至于有人多次推荐他当官，甚至皇帝刘裕多次提拔他，他都“前后辟召竟不就”，自谓：“吾栖隐丘壑三十年，岂可于王门折腰为吏耶？”他曾西涉荆巫，南登衡岳，遍历胜景，竟不知老之将至。后终因年老体衰返回江陵，慨叹曰：“噫！老病将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于是，他便将一生所游历的名山大川，“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在游山玩水的闲适理论上，宗炳是一位大师，在他的《画山水序》中除了继承儒家对山水的道德取譬即所谓的仁智之乐之外，明确提出了“怡身”与“畅神”的主张。他“眷恋庐衡，契阔荆巫”，到真山水中去畅游，目的是为了“凝气怡身”。“怡身”是他面对真山水时所得到的美感享受，“畅神”则是“披图幽对”时所得到的审美满足，两者是一致的。这种对山水审美的积极主动精神，正体现了这一时期由于人性的自觉而产生游历山川的自觉。其对山水的狂热迷恋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位著名的山水诗人和闲游大师是谢灵运。他 21 岁时任职军队文官，随军走遍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游遍了那里的名胜古迹。南朝刘宋时代，因其特权地位受到威胁，政治欲望得不到满足。永初三年谢灵运被外放永嘉（浙江温州市）太守后，便寄情山水，啸傲风月，积句累月地在其治下到处游玩，不再关心政治。永嘉的谢公岭、谢客崖、谢公亭、谢公池、谢公楼、王（羲之）谢祠、谢康乐祠、澄鲜阁等故址至今犹存。他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之游，除了于佳山秀水中求得感官的刺激和心理平衡外，还能掩饰内心对权位的热衷及排遣对政治的不满。谢灵运祖父辈均为晋朝大官僚，家资雄厚，奴仆门生数百。每次外出游历，他头戴曲柄笠，脚蹬木屐，奴仆门生为其“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未知灵运乃安。”（《南史·本传》）谢灵运特爱“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蹻，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后人称之“谢公屐”，俗称登山鞋。这些成就与知识均来源于其闲游活动的实践。谢灵运不愧为我国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山水闲游家之一。

魏晋时的另一位隐逸高人是陶弘景，他的情况与宗炳、谢灵运稍有不同。

《南史·陶弘景传》说他刚一归隐就开始“遍历名山，采访仙药”四十余年，坚持不懈；且游乐之心的浓烈，游乐之趣的高雅又胜出一般道教徒众，是南朝出类拔萃的仙游大家。陶弘景幼有异操，不到 20 岁便在萧齐朝廷里当上了诸王侍读。齐永明十年（公元 492 年）辞职，隐居句容县句曲山（江苏茅山）的华阳洞，自

号“华阳陶隐居”。梁武帝萧衍即位，礼聘他下山从政，陶弘景执意不出。其时凡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不能决疑，武帝便前往华阳洞咨询，对陶备极礼遇。时人因此有“山中宰相”之称。后来梁武帝在给陶的信中问他句曲山中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般迷恋，陶用一首小诗回答武帝：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 阅读材料

#### 【阅读 1 - 1】

#### 王羲之兰亭春郊畅游

王羲之（公元 321 - 379 年），字逸少，因做过右将军的官职，世称王右军。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书法大师之一，又是诗人、文章家和热心的山水游客。《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刚刚从中原避难江南，就爱上了越中会稽西南十余里处会稽山麓的绿水青山。兰亭，在浙江绍兴县西南，地名兰渚，亭名兰亭。那里有崇山峻岭，修竹茂林；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王羲之特别欣赏这里的景致，经常与朋友们盘桓其中，竟日长游。最有名的一次是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农历三月三日。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兰亭内外，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当时身为会稽太守的王羲之约邀右将军司马太原人孙诒公、前余姚县令会稽人谢胜，另有谢安、谢万、孙卓、孙统、支遁等名流雅士和官员等 41 位在这里郊游雅聚。他们在弯曲流淌的溪流旁边环坐开来，一边饮酒，一边赋诗，虽然没有琴瑟笛箫演奏的场面，心情却十分欢畅。各自游目骋怀，饮酒赋诗，抒发了或豪壮或幽雅的情意。尤其是因为那天天气晴朗清新，和风温暖舒适，抬头可纵观天地之广阔，低头可审察万物之繁多，他们借此放开眼界，舒畅胸怀，尽情享受眼观和耳闻的乐趣。正是为着光阴倏忽，美景难再，游乐间咏诗 26 人各有诗作；15 人诗不成罚酒三巨觥。诗成之后，汇成一集，名曰《兰亭集》，诗集之“序”，自然落到了文辞与书法俱佳的王羲之身上。

此时，王羲之已是微微小醉，逸兴遄飞，看着洁白的蚕茧纸，久久没有下笔。或许是酒使他兴奋不已，或许是今天盛况空前的聚会唤起了胸中积蓄已久的激情，他想，就让这激情从胸间澎湃而出吧，让直抒胸臆的文章带着这崇山峻岭的秀美，带着茂林修竹的灵性，带着沉积于胸的韵律倾泻吧。此时此刻，无数的意象汇集胸臆，无数的迁想妙得化作了势不可挡的冲动。他乘势落笔一个“永”字站立在纸上，接着便思如泉涌，直泻而下，“永和九年，岁在癸

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楔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游目骋怀，信可乐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尤其难能的是，王羲之畅游观远较一般人深刻，既跳出了传统的以为死生一体、衰天无别的老庄思想的窠臼，又甚少一般玄游之士那种故弄玄虚、自负清高的气味，表达了能够系心时事，不忘河山破碎、国家兴亡的大志。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和谢安曾经同游古吴国的冶铸遗址，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羲之则批评谢安“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王羲之不但能以山水闲游来探究哲理，陶冶性情，寄托感慨，而且能以山水游畅来浸润他最擅长的书法艺术。王羲之自己也非常看重这篇《兰亭集序》。翌日酒醒之后，他将《兰亭集序》又反复看了几遍，觉得精彩异常，于是又乘兴写了几幅，然而无论怎样，都不能与第一幅媲美。后来，他索性将重写的几幅全部毁去，只留下在兰亭写的那幅，慎重地保存起来。

——摘录、改编自章海荣、《旅游审美原理》[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

### 3. 璀璨的唐宋休闲文化

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此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休闲文化也是一幅艳丽多彩的图画。

汉唐以来总的文化趋势是注重朝气雄风，开拓进取，经世致用，行健不息，有唐一代更显帝国海纳百川、兼容中外之风范，文化上实行了开放政策，儒、道、佛“三教”并立，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等伟大的诗人。文化交流与融合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变化，对文化结构、宗教哲学、文学、音韵学、舞蹈、建筑、雕塑、衣食住行、生活器具、服饰打扮等都有很大影响。这一历史时期的休闲生活，在诗人李白的一生中体现最为典型。

李白在15岁到20岁时，对仙游已经着迷，曾与隐士东严子一起学道于青城山。其时游览山水的兴趣业已浓烈，蜀中名胜如峨眉山、戴天山，都给青春年少的李白留下终生不忘的记忆，也为他后来的漫游生涯积蓄了胆识、热情、才华和经验。公元725年（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李白25岁，这时，他的政治抱负基本成熟。他盼望自己能“投竿佐皇极”；“相与济苍生”；“使环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边”，做一番类似范蠡、谢安的大事业。他对自己的才干则高度自信，自言“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因此，他不但瞧不起一般读书人所热衷的进士科考，也瞧不起一般官吏按部就班的缓慢升迁。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能够



“不屈己，不干人”，只要在社会上扬姓播名，就可以一登卿相，大显身手，于是，他怀着这种天真而又浪漫的理想，“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大约是这一年秋天，李白离开绵州彰明青莲乡，取道清溪，南下渝州（今重庆）。继而，他从渝州出发，经过白帝（今重庆奉节），穿过三峡，稍息江陵。一路上，奇丽的三峡天险使初次出川的青年李白侠气陡增，神采飞扬，写下了那首几乎无人不晓的游览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接着，李白东至襄阳（今湖北襄樊），纵酒赋诗，流连观光——“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开窗碧峰满，拂镜沧江流”。在这里，李白过了数十天意气风发的日子。随后，李白又在霜落江树的暮秋季节，扬帆荆门（今湖北荆门），再由荆门，泛舟洞庭，“南穷苍梧”，攀登庐山，直下金陵，“东游维扬”。在扬州等地，他“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救济那些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落魄公子”，借此传播了他轻财重义、一诺千金的豪侠风范。到27岁时，李白又从扬州等地回到湖北，游于安陆。安陆，相传拥有天下第一大泽云梦泽。他说：“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泽，遂来观焉。”在这里，他爱上了碧山的桃林小溪：“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寄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也爱上了寿山的小巧秀丽，曾“虬蟠龟息，遁乎此山。”他还深得退休安陆的老宰相许圉师的赏识，当上了许的东床快婿，由此而“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李白“酒隐安陆”并没有停止漫游。十年中，他以安陆为轴心，在江汉流域到处游观，到处交结名流。在江陵，他邂逅了道教名流司马承祯、胡紫阳、元丹丘等，和他们一起游仙学道，飘飘然若具仙风道骨。李白游仙是认真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他游览了司马承祯长期修道的天台山，大有“云垂大鹏翻”之感；游庐山，欲在山中“漱琼液”、“洗尘颜”；游泰山，在山中“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游焦山，则盼望仙人“举手来相招”，最突出的是在嵩山的游仙。他的“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的挚友元丹丘，是名修道学仙之士，两人在嵩山“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过访神仙焦炼师，并“闻风有寄，洒翰遥赠”，以示对其“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的倾慕。为了寻拜高师，还一起游仙到随州（今湖北随州），从紫阳先生学仙。那位紫阳先生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一个“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的高人。李白希望得其真传，“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从他后来说“子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可知，他确实得到了紫阳的指点。到了晚年，他干脆请其尊师高如贵授道箓，入了道门。此后，越发认真地游仙了，据其族叔及朋友说，李白竟要“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一路游仙过去，至“仙药满囊，道书盈筐”。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中，他曾详细描写自己炼